

识·书·学·参诗起点

——严羽诗学思想的承传与推进研究(之二)

邓 心 强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 严羽提出的系列诗学观念影响深远,但这并非全是他的独创。严羽以通达的眼光对历代理论资源兼容并蓄,为我所用地“拿来”,在广泛吸收和精心改造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巧妙地创造,纳入其独特的诗学体系中,使之具有深刻的辩证性和独立的美学品格。其诗学在此前相同或近似话语的基础上,获得了空前的深刻性,被赋予了新的面貌。文章选取“识”、“书”、“学”与参诗起点等方面作为切入点,管中窥豹,以洞其堂奥。《沧浪诗话》中的许多诗学思想是严羽继承前人与推进更新的统一,显示出文化积淀和理论家敏锐眼光及创造力的统一。

[关键词] 严羽;《沧浪诗话》;江西诗派;承传;推进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09)03-0080-(05)

《沧浪诗话》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是极富鲜明特色的一部诗话著作,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和理论价值,对于扭转受理学浸染和江西诗派影响的诗风并使之回归到艺术本体论的诗歌道路,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严羽处在诗学动荡变幻的南宋时期,他有的放矢地对诸如“识”、“书”与“学”、参诗起点等既定话题加以改造和推进,赋予其深刻的理论内涵,对于宋代诗坛具有相当的针砭作用。对明清“神韵”说、“性灵”说、“格调”说的催生具有一定的开启意义,也给了后世诗人和文论家深远的影响。

一、问题之思

严羽及《沧浪诗话》在后世的学术价值日益凸显,这既与该著改变了诗话风气、建立了诗学体系有关,更与严羽提出系列诗学术语与范畴、鲜明地创造出独特的诗学思想有关。对此,学界同行都有深入研究和广泛认同。必须指出的是,笔者并不否认严羽诗论的真知灼见和杰出成就,他的许多诗学观点是在充分继承前人和同时代人的基础上形成的。他博采众家之长,在广泛吸收前朝尤其是宋代各种诗论资源后,作了富有个性化的独特创新,高瞻远瞩地将之纳入比较严密的诗学体系中。

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来一直延续不断,薪火相

传,诗歌亦然。古代批评家的许多诗学观念具有前后承传性,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得以不断推进的,后代文化不可能止步不前,它必须依托前代文化作为生长点,不可能在真空中舞蹈;前代文化作为积淀又为后代提供一定的养料和水分,这体现出文化发展承传和推进交织统一的规律。严羽的诗学理论即是这种辩证法的统一。

严羽及其诗学不仅是明清时期人们研究和争论的焦点^[1-2],更是当今学术界关注和探讨的一个热点。^[3]对于严羽诗学产生的特定文化背景人们并不陌生,许多学者也将之与江西诗派进行了一定的对比^①,从中可以部分见出严羽的继承和推进,但在笔者看来,对严羽诗学的研究总体上存在以下两个不足:一是侧重分析前代江西诗派、宋代理学、象山心学甚至佛教思想等对严羽的各种影响,是严羽对前代文化的继承,而并没透视严羽究竟在哪些细微处作了怎样的变通和推进,没有具体落实严羽在哪些地方进行了改造和创新;二是严羽处在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所受的影响是多元和复杂的,有些结语值得商榷,不能下得过早或绝对化。在没有第一手文字资料和直接证据的情况下,不能武断地认为,严羽的某个诗学术语就是直接从前代某派中来的,即不

[收稿日期] 2008-09-16

[作者简介] 邓心强(1979-),男,湖北大悟人,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与古代文论、文艺学等。

能简单化。对于种种不同的“前影响”和新变,要展开具体而深入的分析,才可于钩沉、鉴别、对比和阐释中窥其堂奥。

因此,鉴于严羽论诗的鲜明针对性和强烈实践性,笔者以为:第一,应把严羽放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在更大的诗学环境中审视,他在建构自己诗学的时候究竟继承了古代什么同时又推进了什么,哪些是他对前人的精心吸收和充分借鉴,哪些又是他的独特创新(哪怕只是局部)和演绎推进。力求公正、客观地把严羽和前人的思想观点区别开来,还其本来面目。第二,对于严羽继承和吸收的前代资源,必须归还其“著作权”;而对于严羽的独创,则须分析他究竟是怎样来创新的;他在前人的基础上作了怎样的加工,有了哪些补充和创新;他在一些关键环节是如何来推进并赋予许多范畴术语以新的内涵的。人们可以从前后鲜明对比中看到严羽在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中的地位及贡献,也可从历时性的坐标中透视严羽诗学思想的辩证性和深刻性。这对于更深入地理解严羽诗学观、把握其美学思想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受篇幅所限,这里笔者重点选取关注度比较高的“妙悟”作为突破口,以点带面地分析和透视。

二、以识为主

诗“识”是艺术创作、艺术欣赏的基础,是鉴别作品等级和优劣的重要前提。而“识”在严羽的论敌——江西诗派那里也被广泛运用。且看表 1。

表 1 江西诗派和严羽论“识”比较

	江西诗派	严羽
论 识	“学者要先以识为主,如禅家所谓‘正法眼’者,直须具此眼目方可入道。”(黄庭坚语,见范温《潜溪诗眼》) “更能识诗家病,方是我眼中人。”(黄庭坚语)	识:“夫学诗者,以识为主立。入门须正,立志须高。”(《诗辨》);“野狐外道蒙蔽其真识,不可救药。”(同上);辨:“辨家数如辨析苍白,始可言诗。”(《诗体》);“作诗正须辨尽诸家体制,然后不为旁门所惑。今人作诗差入门户者,正以体制莫辨也。”(《答吴景仙书》)

“识”最初源自佛教,指辨识、辨别等。后来运用中指向辨别美丑和善恶的能力,侧重于人的鉴别力。唐代刘知几强调史家必须具备才、胆、识三要素,这都是严羽等宋代文论家以识论诗的前奏。表中可见,以识论诗并非严羽首创,他是在充分吸收江西诗派论点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但从双方所论之“识”看,具体内涵和指向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或者说两者存在着相当的差异。严羽正是在这种差异中发展、建构着自己的诗学观。

首先,从表 1 中可见黄庭坚之语在强调“识”是学习的第一步,也是关键性的一步。若“不见古人用意处,但得其皮毛”,则“去之更远”,是缺乏识见的结果。无“识”则无法看出诗歌的弊病并区分其优劣、次第。“识”能赏鉴诗之精华,可充实学养,读者只有具备较强的识别能力才能在千差万别的众多诗歌中作出准确的选择。故黄庭坚又曰:“更能识诗家病,方是我眼中人”。在吕本中看来,“能识”是超越诸辈的必要条件。

从表 1 中可见,严羽大量关于诗“识”的论述和要求可作名词解释,即长期参诗中获得的一种见识、识别力。而多处是作动词“辨别”、“鉴别”和“区分”等来讲的。有的属于鲜明强调,有的则是论及与识相关的问题时展开的。宋代三教合一,以禅喻诗的风气相当盛行,各种禅语被不同士人广为运用和借鉴。严羽深受前辈诗学话语的影响,在江西诗派论“识”的基础上,非常响亮地提出“夫学者以识为主”作为其著书之端。他同韩驹一样以禅为喻,分诗之高下,认为“乘有大小”、“道有邪正”,因而“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诗辨》)这正是强调鉴别力而不至于被旁门邪道蒙蔽、远离艺术真谛。正是在识的引导下去识别不同时代诗歌作品的水准,同时去熟参,在博参的基础上提升识力,互为推进。可见在强调和重视“识”对于诗歌学习与创作的意义,严羽是立足于江西诗派的,他明显受了前代话语的影响。

其次,二者不但重视识别、辨鉴不同诗歌、流派和诗作的门派、优劣、高下等,而且也“识”不同诗人诗作的独特风格和个性。但严羽以“识”论诗与江西诗派不同在于,他并没有单纯停留在学诗的知性品格上,而是主张在熟“参”历代名家之诗的基础上,悟出关于诗的“真识”。严羽以开阔的眼光来审视历代诗人诗作,以对诗歌发展规律的敏锐洞察力来领悟诗歌的审美特质。因此,这需要结合严羽在《沧浪诗话》各节中论“识”来综合判断,其“识”不是单纯的鉴别,而是处于史“识”(汉魏晋盛唐与宋之分,属诗歌发展史的划分)和诗“识”(崇尚气象和词理意兴之诗美)的双重统一,具有浓厚的历史底蕴,且是在“妙悟”、“兴趣”说的主宰下进行的。相对而言,江西诗派“识”诗的取向和动机多在诗的局部如字法、押韵、用事、立格等方面,偏重于作诗;而严羽论“识”则侧重于对诗美的整体感知,不纠缠于琐碎而理性的工匠之法上,不在一味地仿古、拟古上丧失作诗应有的妙悟、灵气和情趣。从这一点来说,严羽以“识”论诗的着眼点具有新变精神,超越了

前人。

三、“书”、“学”新论

严羽继承了江西诗派之论“识”,但在具体培育“识”的途径、方式上与之产生了很大的不同。这牵

涉到严羽对“学”和“书”态度的推进与创新。除了学诗的起点在《诗》《骚》上有别外,这里专就学习书本的对象、范围和态度来作一比较,见表 2。

表 2 江西诗派与严羽论“学”、“书”的比较

	江西诗派	严羽
学的对象和范围	“读书数千卷,无不贯穿。”(黄庭坚褒扬刘壮舆语);“遍参诸方”(韩驹《赠赵伯鱼》);“学诗须熟看老杜、苏、黄,亦先见体式,然后遍考他诗,自然工夫度过人”。(吕本中《童蒙诗训》)	“学汉魏与盛唐诗歌者,临济下也。”(禅宗五家之一,力举顿悟,严羽深受其影响,故激赏以比之);“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嗟乎!正法眼之无传久矣!唐诗之说未唱,唐诗之道或有时而明也。”
对书本和积累态度	“力学有暇,更精读千卷书,乃可毕此能事。”(黄庭坚为外甥指点迷津语,见《山谷题跋》卷六);“然学书时时临摹,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书细看令人神,乃到妙处,唯用心不杂,乃是入神要路。”(黄庭坚《书赠福州陈继月》)	“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辨》)

为了提高“识”力,严羽和前辈尤其是江西诗派都提出“参”,都把充分学习前代作家作品作为提升主体艺术修养的必要前提。通过“熟参”诸家体制,在比较中鉴别,“其真是非自有才能隐者,”(《诗辨》)这样,有了一定的识辨力就能区分良莠,辨别高下。但双方各自的艺术趣味、审美理想诗学旨归不同,被认可的文本范围是不同的,心目中的经典之作是有出入的。这集中表现在他们对待“学”的对象和范围、对待书本的态度有很大的不同。

重视书本的学习和对前人作品的积累,是严羽之前其论敌江西诗派的突出特征。但二者“书”和“学”的出发点和诗学背景是截然不同的。江西诗派是为了使较为圆熟的语言变得更为精健、劲挺,更加合乎其审美趣味而倡导多读书、多熟悉古人的诗句,在临摹中自成一家之格调。他们只把诗情、游览和生活的激发当作诗外功夫,将目光转向书本是明显受了当时理学思潮的影响。在能力、技巧问题上过于依赖理性,以为能力、技巧都可以后天习得。黄庭坚论诗便每每与读书有关,主张竭力从读书中获取作诗必备的“准绳”、“规矩”。

而南宋严羽则是背离传统载道派和道统论的艺术派,在兴趣和妙悟、情性等要素构筑的框架内看待书本和学习,主张诗歌的情感抒发是自然而然的,不是经过理性抑制和法度束缚的,诗要有情趣和余韵之美。因此,严羽论“书”和“学”时必然有对传统的继承,更有他独特的眼光。他看到了仅仅采取江西诗派之“学”是于诗不利的,他敏锐地提出“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这在一味拟古、讲究锤炼工夫的江西诗派看来,无异于石破天惊之论。严羽之先师包扬和先辈等人对书的态度——

不可尽信,给了严羽一定的影响。^②但其独创之处在于,他虽然不满于江西诗派过于依赖书本和学习来作诗的方式,但同时鲜明地提出“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其对书本积累与诗歌关系的认识,表现得比前人辩证和理性得多。而对诗歌本质特征的认识,则又深刻得多。

过于重视书本的学习,使江西诗派后期陷入困局,没法将有意识的学诗上升转化为更高层面有深刻人生感悟及创作冲动的无意识作诗,这主要是情意内容与法度形式之间的对立紧张无法得到有效缓解。刘克庄曾指出诗坛一味学、书的弊端:“……岂非资书以为诗,失之腐;捐书以为诗,失之野奥?”^[4]其论“失之腐(野)”与严羽“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的诗学主张实质上是相通的。因此,客观地估量书本学习对作诗的基础作用,吸取前人有益的经验方法而掌握好度,辩证地、科学地看待书本学习及作诗的关系,是严羽高瞻远瞩而胜过前人的地方,也是他就前人局部观念而集零碎为整体、以辩证性和系统性取胜而超越前人的诗学观。严羽在间接吸纳前人正、反意见的基础上,提出如此辩证的认识,有机地将书本和别材、学和悟等结合起来,从而缓解了诗歌与法度、情感与理性之间存在的某种矛盾。

中国历代诗格、诗法对书本知识相当重视和执着。严羽同样意识到学习书本、积累经验的重要性,这是其继承之处。但他没有落入窠臼,恰恰在对书本和作诗的辩证思维与周密思考上,表现出创新和推进。表 2 可见,严羽显赫醒目、单刀直入地提出单纯是“学”、仅仅是“熟参”是不够的,诗之为诗还必须有其独特元素:别材、别趣!这是一种仅靠议论和

才华无法创造余韵和兴致的主体资质和艺术修养。其“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充满思辨性，这把他的诗学体系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也是他摒除宋代数百年宗唐、道统及晦涩之风等传统而拨云见日的过人之处，更是其诗论重点推进的地方。因此，就主张悟不废学、情不废理来说，严羽诗学是一种折中诗学，相比前代诗学更加客观和科学，这是严羽的独特贡献。其诗论绝非横空出世，无中生有，而是对唐之前审美文学一路的继承和弘扬。

表 3 江西诗派与严羽在参诗起点上的比较

	江西诗派	严羽
学的起点	“熟读《毛诗·国风》与《离骚》，曲折尽在是矣。”（苏轼）；“广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黄庭坚：《大雅堂记》）；“学者须以三百篇、楚辞及汉魏间人诗为主，方见古人妙处。”（吕本中：《童蒙诗训》）	“先须熟读《楚辞》，朝夕讽咏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籍观之，如今人之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诗辨》）；“须歌之（指楚辞）抑扬，涕夷满襟”。（《诗评》）

文学史上，自汉至唐，一直存在着《诗》、《骚》之辩。但此两者作为中国诗歌的两大源头，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是不一样的。《诗》自汉代定于一尊后被列为经，士大夫耳熟能详，它的作用被汉儒定位在“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伦理道德功利上，绑上了政治和道德的战车，成了反映士人“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伦理思想的窗口。而江西诗派诸诗人的思想意识里，儒家观念占了主导地位。^③以“露才扬己”（班固语）著称的屈原等作家创作的楚辞则“发愤以抒情”，开创了中国言情文学的先河。一般来说，大凡过分崇《诗》贬《骚》者，皆抱有正统的儒家文学观；而大凡比较重视楚辞者，往往从艺术审美的角度立论。严羽熟参诗作绕开正统的《诗经》而以《骚》始，表明他对性情文学的激赏和厚爱。放弃了《诗三百》而首推《楚辞》反映了他理想的艺术标准和某种创新，他要求吟诵《楚辞》需充满感情，全身心投入和体味，正是从纯粹艺术角度立论的。这也遭到后代正统儒者的非议。如清代许印芳在为《沧浪诗话》作的《跋》中指责严羽说：“虽知以识为主，犹病识量不足。……故论诗惟在兴趣，于古人通讽谕，尽忠孝，因美刺，寓劝惩之本义，全不理睬”。

这里许印芳以传统封建士大夫的儒学眼光来评判诗学，对严羽故意绕开——或者说只字不提大家都认可的《诗经》，表示出极大的不满。在笔者看来，这是以己之心度严羽之腹，缺乏对严羽诗学精神的真正了解。这也从反面证实了严羽诗学观在关键处和原则问题上的与众不同和独特创新。严羽推举以“参”获“识”的首要经典是《楚辞》而非《诗经》，并不是偶然的，他对时人和后人可能引发的误解、质

四、参诗起点

为了增加“识”，获得一定的审美鉴别力，严羽和前人都开出了作品单子。首先，从最先推出的作品看，江西诗派提倡学诗当自《诗三百》始，而严羽则倡始于《楚辞》，可见两者迥异其趣，这也并非偶然，恰恰折射出双方的诗学取向，尽管《诗三百》在汉代儒家成为立国之本后取得了经学的经典地位。从这两种文本来看，严羽的诗歌本体观表现得比江西诗派返归艺术之本更自觉、更彻底。见表 3。

疑甚至批驳是作了充分心理准备的：“其合文人儒者之言与否，不问也。”（《答吴景仙书》）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严羽长远的艺术眼光和不屈的战斗精神。

注重篇法、讲究曲折是宋人推崇《诗经》的真正原因，而这于反对以文字、才学、议论擅场并一味依赖技法来作诗的严羽，是格格不入的。他以《离骚》为典范之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作为宋代的一名知识分子，严羽对《诗经》篇章和赋比兴等艺术手法不可能不了解，但他敢于不被传统陈见束缚而另立新论，是需要巨大勇气的。中国诗歌发展历数千年之久，今人再来看《诗经》，并不否认其中诸如《氓》、《东山》等名篇也是极具“兴趣”之美的，应该说是符合严羽诗学观的，但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政治和伦理道德对《诗经》的渗透甚至错误阐发，严羽首选在艺术手法上比《诗经》大有长进的《楚辞》也是情理之中的。从根本上来说，严羽的诗学观直接绕开政治和道德要素，力图从传统的羁绊中超脱出来，趋于纯艺术论，这也使他的诗论更接近诗歌艺术的本体。

五、结语

由上可见，严羽诗学思想的继承和创新呈现出漫长、复杂乃至微妙的多元状态，需要细细地逐一辨析。这与严羽处在多种文化思潮相互碰撞的南宋时期有关。中国诗歌在宋代理学渗透下需要寻求新的突破，自宋初田锡、柳开、欧阳修到王安石、黄庭坚以来，一代又一代诗人无不承受着巅峰的唐代文化冲击和唐代灿烂的诗歌艺术的压力，他们在竭力探求诗风的嬗变，各自提出符合宋代审美趣味的艺术范式，即便是宗唐也表现出千姿百态的诗学话语，有的对于诗歌的发展可谓“重不幸”。并且，宋代出现了

儒、道、释三教的合流,尤其是儒学以理学的面目呈现,佛教向禅宗演进,道教向老庄回归,日益崇尚主体性成了宋代哲学精神的趋向,士大夫们也都游走于修心养性的老庄和明心见性的佛禅之间。这种宏观的文化背景为严羽诗学的产生提供了土壤,也为其思想的新变提供了一定的外部环境。宋代以禅喻诗的风气盛行,许多佛学话语在士大夫之间流行,成为时代的共通话语,严羽巧妙地化凡为奇,化俗为雅,独出机杼,推陈出新。而严羽就是在至少如下七个方面构筑的文化场域中寻求诗学突围的:

一是传统资源:前代兴、趣、韵、味等艺术一派;二是宋初正统、道教论诗学观;三是佛学观念的渗透和以禅喻诗风气的盛行;四是江西诗派主张及其后期蜕变和逆反;五是江西诗派反对者们的意见和看法;六是师门影响:与朱熹、包扬、包恢的关系;七是同时代江湖诗派和四灵诗人的诗论。

就严羽所处的南宋末期而言,传统的(如六朝钟嵘、刘勰诗论等)与当代的(如江湖诗派)、老师的(陆象山、包扬等)与师兄的(包恢诗论)、论敌的(江西诗派)与友人的(戴复古诗学等),都为严羽探寻理想诗歌的出路提供了某种参照系和突破口。严羽并没有视前代丰厚的文化资源为累赘,或单纯跟风某一家某一派,而是巧妙地加以继承和吸收。这些之前和同时代的种种诗学流派、思想等,一经天才理论家严羽的演绎,便产生出深刻的辩证性和严密的体系性。

而且他虽以江西诗派为箭靶,猛烈批判江西诗派把诗歌引入歧途,但同时他也自觉或无意识地充分吸收了论敌思想中许多有益的成分。这体现出继承中的二律背反来。此外,他在思想、个性与话语等方面受到师、友极大的影响,他是接“心学”的“接力棒”来承传诗学薪火的。^①严羽对前人诗学思想的继承绝不局限于与他同时代的南宋或稍前的北宋,他以宽广的眼光和开阔的视野审视其前一千多年的诗学史。尽管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直接表明严羽对唐以前悠久传统诗学的继承和吸收,但可以从古代孩童的启蒙教育和成长环境来推测,前朝的诗学资源必定在博览群书、好学上进的严羽心中打下了烙印。从先秦到汉唐的比兴说、缘情说、象外说到严羽所论兴趣说等,诗学发展演进脉络可谓一线相连,遥相呼应。

从对严羽继承前代、他人各种诗学资源来看,严

羽诗学是他统揽前人、为我所用的集大成,体现了继承传统和独特创新的统一;体现出严羽兼容并蓄的大家风范,展现出一个诗人兼批评家独特的眼光和开阔的视野,以及他自信的学术个性和对诗学旨趣的坚守精神。这些都是他在继承基础上展示出的宝贵学术品格。如果没有历代诗学提供的丰厚积累,没有宋初诗学及江西诗派等正、反方面的理论资源,没有四灵诗人、包恢等话语的铺垫,没有禅宗话语在诗界的广泛流行,就不可能有严羽诗学理论的最终格局。严羽论诗绝不人云亦云,他会慧眼识珠,敏锐甄别,发现问题的关键之所在,一针见血地提出诗学的要害,严羽诗论表现出的这种学术个性和趣味追求是独特的。如果仅仅满足于前代诗学话语的照搬或引用,而没有将之纳入自身美学体系中加以改造(哪怕只是局部),没有对系列术语的改动和新变,就没有严羽诗学的重要地位与深远影响。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严羽诗学是文化积累和个人独创的结晶,是严羽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眺望。

[参考文献]

- [1] 钱振鐳. 谪星说诗[M]//郭绍虞. 沧浪诗话校释.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10.
- [2] 冯班. 严氏纠谬[M]//郭绍虞. 沧浪诗话校释.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284.
- [3] 蒋述卓,等. 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49.
- [4] 刘克庄. 韩隐君诗序[M]//宋代文艺理论集成.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985.

注释:

- ① 见曹东《论严羽美学思想的文化背景和哲学基础》,载《苏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曹东《试论严羽诗论与南宋理学的关系》,载《洛阳师专学报》1998年第4期;程自信《略论严羽对江西诗派的态度》,载《九江师专学报》1985年第4期。
- ② 据黄宗羲《宋元学案》记载,包扬曾认为“读书亲师友是充塞仁义之说”;朱熹《朱子语类》载包扬之言:“书是溺心志之井。”
- ③ 如吕本中在《夏均父集序》中提出那段关于创作艺术的著名的“活法”论之后,接着就引述了孔子关于《诗》可以兴、观、群、怨的述说,尔后批评道:“今之为诗者,读之果可使人兴起其为善之心乎?果可使人兴观群怨乎?果可使人知事父、事君而能识草木之名之理乎?为之而不能使人如是,则如勿作。”近乎是一副道学家的说教。

[责任编辑:夏畅兰]